

百年中国
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中国社会文化 人类学 / 民族学百年文选

（中卷）

潘 蛟◎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社会文化 人类学 / 民族学百年文选

王博 主编
副主编：陈洪波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 7-302-12531-2
定价：48.00元

百年中国

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中国社会文化 人类学 / 民族学百年文选

(中卷)

潘 蛟◎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责任编辑：石红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选 (中卷)/潘蛟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5

(百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ISBN 978-7-80247-024-8

I. 中… II. 潘… III. ①社会人类学—文集 ②文化人类学—
文集 ③民族学—文集 IV. C912.4-53 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295 号

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选 (中卷)

Zhongguo Shehuiwenhuarenleixue/minzuxue Bainianwenxuan

潘 蛟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30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498 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8325

责编邮箱：shihonghua@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9.25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150.00 元

ISBN 978-7-80247-024-8/C·072 (20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策划：张海洋、沈林

百年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文库编委会

主 任：周明甫

副主任：郝时远 黄忠彩 景 军

杨圣敏

编 委：（按姓氏拼音）

揣振宇 丁 宏 郝时远

何星亮 黄忠彩 和少英

景 军 刘 武 良警宇

罗红光 潘 蛟 沈 林

滕 星 王建民 王铭铭

王庆仁 王仁湘 王 甘

翁乃群 吴新智 徐杰舜

杨圣敏 张海洋 张继焦

周大鸣 周明甫 周庆生

庄孔韶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良警宇

编务秘书：杨燕军 王树春 白 睿

王丽梅 谈 娟

百年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文库总序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是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最具影响和规模的学术组织，其五年一届的世界大会被称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奥林匹克大会。2003年，中国获得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的举办权，筹备和开好这次世界大会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盛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国家。千百年来，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国和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历史资源。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社会文化经历了巨大变迁，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世界十分关注。中国对于发展的理解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经验，已成为中国和世界人类学民族学鲜活生动的研究资源。

人类学民族学进入中国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几代人类学民族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体系。

为了迎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界世界大会的召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团结和动员我国学界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做好各项学术准备工作：展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就，总结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经验及其对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贡献，整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资源，不断提高中国

学者的国际交流和对话能力，促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

编辑出版《百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是做好学术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一项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首先是编什么的问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一百多年来，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拥有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曲折的发展历程，要将这样丰富的内容筛选收编到篇幅有限的丛书之中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论文的取舍上，既要考虑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整体的历史脉络，又要照顾到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重要文章反映出来的时代和地方特色。这对于编辑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次是如何编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各具特色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体系。为了客观全面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整体概貌，我们采用传统的人类学四分法，按照考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人类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四个方向收编论文。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在篇幅上加大了社会文化人类学部分的内容，同时增加了概论性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文献索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重要著作提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等卷。

第三是谁来编的问题。编辑出版《文库》实际上就是对百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作一次全面地回顾、梳理和总结，这既是一项琐碎浩繁的资料收集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为了保证《文库》编辑工作的顺利开展，成立了有各个分支学科学术带头人和各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编委会，编委会中的专家几乎全是教学、研究一线的学者。为了保证收编论文符合“既能反映历史发展脉络，又能体现时代印记”和“理论建树，学术发展”的要求，编委会在各分册主编自主编选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入选论文。并在此过程中，各分

册主编之间以及编委和各有关学者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保障了《文库》的质量。

《文库》的编辑出版是百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历程的一次梳理和总结，也是百年成果的一次展示，同时也为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科研留下一套宝贵的资料性、工具性丛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套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普及性丛书。《文库》在编选编写过程中得到广大学者的欢迎和积极参与，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种种原因《文库》编选编写工作中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憾，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主席 周明甫

2008年9月10日

自序：说中国人类学的舶来

潘 蛟

人类学、民族学是作为西学/新学在近代传入中国的。当然，如果硬要把“四夷传”，《山海经》，《淮南子》等也算进来，那我们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就不仅长了去，而且还是本土的。但是，一般不这样算。这倒不是怕一不小心，我们又成了历史最悠久的——希罗多德（前 484—前 430/420）记述“四夷”显然是比司马迁（前 145 或前 135—？）早了很久，也不是因为还有比希罗多德更早记述少数民族的——据说在古埃及人三千多年前的王室墓中就留下有记述不同人种的壁画^①，而是因为大家觉得认定一门学科的确立，标志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知识对象是否明晰，问题、方法和结论是否正确，而且还在于它是否已被专业制度化。

认定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根据当然可以是：一百多年前便开始有大批人类学、民族学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例如，1895 年严复翻译《天演论》，1902 年萨瑞翻译《族制进化论》，1902 年梁启超发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1903 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1904 年蒋智由发表《中国人种考》，等等。但我以为，更有标识意义的恐怕还应该是

① A. 哈登著，廖泗友译：《人类学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3~5 页。

1903年。这年清王朝学部颁布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人种学被列为了国史和西洋史两门的选修课程。同年，林纾和魏易翻译了《民种学》，并经清朝官学大臣审定，交由北京大学堂印行。^①根据这些，我们可以说1903年是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被专业制度化的开始。

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是舶来的，这个事实对于理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性状和特点很重要。长期以来，人们在学科名称、民族定义等问题上发生的争论之所以总是容易被还原成翻译问题，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之所总是未竟的事业，直接或间接都于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系舶来这个事实有关。否则，有关民族定义的争论问题就不会蜕变成“民族一词的译名的争论”，而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也就不会升华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中国化。总之，我觉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许多性状都与它的舶来相关。它的一些性状可能是它舶来时的直接携带，但有的则可能处于对其舶来性的刻意改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我看来都与它系舶来这一事实有关，因此我把这称作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舶来性。

民族学（ethnology）^②的学科译名自开始就有分歧。1903年，林纾和魏易曾把它译成“民种学”，清政府学部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则称之为“人种学”，此外还有“人种志”，“种族学”等译法。1926年，蔡元培先生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民族学这个译名算是在业内被固定了下来。但这也只是业内而已。在文史哲等其他学界，译做人种学、人种志的仍不时有之。对于这些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75，78，82页。

② 德文作 volkerkunde，法文作 ethnologie，俄文作 этнография。

不够专业的译法，林耀华先生在 60 年代^①，杨堃先生在 80 年代^②都曾作过指正。但近些年来，民族学界内部有人揭竿而起，认为更恰当的译名应该是“族类学”而不是“民族学”。理由大致是：从词源上看，ethnology 是由 ethnos 和 logos 合成演变而来的。在古希腊语中，logos 的所指是理性和学识，但 ethnos 的所指却不是“民族”，而是“族种”、“族类”，“其基本语义是野蛮落后的异种人、异族人和异教徒”，而且 ethnology 自来也是以非欧洲殖民地社会和人民为研究对象的，因此称之为“族类学”或“族种学”更合适^③。

人类学在译名上倒是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在人类学的学科界说，以及它与民族学的关系上，开始人们的看法却是有分歧的。例如，1916 年，孙学悟在《科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人类学之概略》一文，把民族学^④看做是人类学下面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1926 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十二号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认为“人类学是以动物学眼光观察人类全体……然现今民族学注重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头绪纷繁，绝不是人类学所能收容”。

显然，孙学悟和蔡元培的分歧在于，孙介绍的是美国人类学科框架，蔡介绍的则是德国人类学解说。在德国的学术传统中，人类学只相当于美国的体质人类学，它并没有把民族学纳入麾下。

但应该指出的是，一般认为，人类学一词的拉丁文形式

① 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第 44 页脚注 2。

② 杨堃：《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第 7 页。

③ 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第 84，92～93 页。

④ Ethnology，孙译之为“人种学”。

(anthropos+logos) 出现于 16 世纪初期。1501 年，德国学者亨德（Hundt, Magnus）曾把此词用做他研究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物学专著的书名。在从这以后直至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人类学一词专指的也是人类人体构造和特征研究。一直至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即便在英美，人类学一词所指的主要是人类体质特征研究。

还应该注意的是，相继建立于 19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的法、英、美等国民族学会，均曾把人类学视作自己属下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个时期的民族学学科界说十分宽泛，巴黎民族学会认为自己的研究范围是“鉴别人类种族要素、其身体构造，知识与道德特点，语言、历史的传统”。

不满于民族学的这个宽泛解说，法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在 1859 年单独建立了“巴黎人类学会”。他们认为，人类学既然是研究人类的学科，那么，无论是人类的生命还是人类的生活都应该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人类学不仅不应该是民族学属下的研究领域，相反，民族学应该划归在人类学属下。法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界说争纷一直到 1889 年才告结束。这年召开的巴黎民族学会开始承认民族学和人类学是并立的姊妹学科，前者研究人类文化，后者研究人类体质^①。

在英国，成立于 1863 年的伦敦人类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事实上是从伦敦民族学会分离出去的，而且直到 1870 年，这两个学会才合并成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会。

① A. 哈登著，廖泗友译：《人类学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1~2 页。“人类学”，见吴泽霖编：《人类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第 30~33 页。卫惠林：《民族学的对象领域及其关联的问题》，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 年第 1 期。

学会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①。在这个学会下面，用社会人类学替代民族学，并与体质人类学加以区分，应该说是自 1908 以后的才逐渐形成的形成的传统^②。

在美国，据说较为正式地把人类学中研究文化的领域称做“文化人类学”始见于 1901，而人类学发展成下辖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四个分支的综合学科，则可能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才得以定型的^③。孙学悟 1916 年介绍人类学时虽然也提到了人类学下含四个组成部分，但他所列的四个部分是：“一人体学（somatology or physical anthropology），二人性学（ethnography），三人种学（ethnology），四古物学（archaeology）”^④。显然，这时文化人类学一词尚未流行开来，今天所称的民族学、民族志、考古学被他分别翻译成了“人性学”，“人种学”、“古物学”。在其出版于 1934 年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林惠祥列出的人类学的四个分支是：（1）文化人类学（= 欧洲大陆的民族学 = 英国的社会人类学），（2）体质人类学，（3）史前学（史前考古学），（4）民族志^⑤。显然，这时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名称已流行开来，但语言人类学还没有被列入人类学麾下。

① Stocking, George W., *Victorian Anthropology*, pp. 247, 256.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7.

② “人类学”，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词典》，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2 年出版，第 11~14 页。

③ “人类学”，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词典》，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2 年出版，第 11~14 页。“文化人类学”，见覃光广等编：《文化学词典》，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158~159 页。

④ 孙学悟：“人类学之概略”，《科学》第二卷第四期，第 431 页。

⑤ 见《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出版，第 4~25 页。

上述情况表明，人类学学科框架在西方并不是自来澄明，一成不变的，把国内的学科界说和一些基本概念纷争归咎于对于西学概念的理解不够精准或翻译不当，这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通常被当作对于同一研究领域所用的不同称谓，但实际上这些不同的学名代表着不同的学科传统和研究取向。

今天的研究表明，民族学一词创用于 18 世纪中后期以德国哥廷根为中心的学者群中。这个研究领域的兴起与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和历史哲学传统有很深的关系。它最初的研究兴趣并不在于非欧洲的原始民族，而是通过历史语言学和文化习俗比较来研究各民族的起源和相互之间联系，重写北欧、东欧以及俄国（包括西伯利亚在内）的历史^①。借助于比较语言学和文化历史来研究各民族的起源和相互关系，关注人类文化的多元和彼此间的历史关系，这是民族学在研究方法和取向上的特点。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时的人们把这个研究领域称作 ethnology，但他们并没有将其研究对象称为 ethnos 或所谓的“族类”，而是称之为 nation/民族，所谓的各民族的起源亦即是 the origin of nations。就此来看，把 ethnology 译作民族学，这并没有什么不妥。

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受德国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哲学的影响很深。博厄士时代的历史特殊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德国民族学的某种延伸或发展。尽管文化人类学一词在 20 世纪初既已在美国流行，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像拉德克利夫-布朗这样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仍旧倾向把博厄士等人的研究称作民族学研究。

社会人类学一词在 20 世纪初就已在英国得到了较为正式的

① Vermeulen, Han F., “Origin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thnography and Ethnology in Europe and the USA”, in Han F. Vermeulen et al. (eds.), *Field Work and Footnotes*, pp. 39~5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使用，例如，弗雷泽在 1908 年就被利物浦大学被聘为英国的第一位社会人类学讲座教授。但一般认为，对于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所做的区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由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的界说才得以明确的。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看来，社会人类学关注的社会通则，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归纳和比较，因此也称之为“比较社会学”。而民族学关注的则各个社会的特性，适用的方法和解释只能是历史学的解释^①。

最初传入中国的应该说是德国的民族学传统。林纾和魏易翻译的那本《民种学》原作者就是一位叫做哈伯兰（Haberlandt）的德国民族学家。蔡元培的民族学也是在德国学成的，1926 年他在《说民族学》一文中所谈的也基本上是德国的民族学理念。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他担任院长并兼任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的民族学组组长。1949 年前以中央研究院和中山大学为中心形成的所谓中国人类学南派也就是所谓的民族学派。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关系较近，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社会人类学进入中国要稍晚一些，而且它的进入实际上是吴文藻等人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果。在创建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吴文藻等人感到那些用于研究西方工业社会的社会学方法不太适用于中国研究，于是便开始探寻适于研究中国的方法和理论。结果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带头人 R. 帕克和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倡导者拉德克利夫布朗被聘请来燕京大学讲学，费孝通、林耀华等人被安排去海外学习人类学，促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人类学化。1949 年前以燕京大学为中心而形成的这个研究团队亦被称做中国人类学的北派。与社会学关系密切，主要研究汉人社会，偏重结构功能分析，这是北派人类学的特点。

①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1～30 页。

中国人类学的南北之分结束于 1950 年。通过高校院系调整
和思想改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被当做西方资产阶级的伪
科学被撤并，原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被转变成了民族学家。民
族识别，原始社会史，中国少数民族的三种社会形态（原始社
会、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成了 1949
年以后中国民族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这次范式的整齐和统一是参照苏联的民族学范式来进行的。
前沙俄的民族学是在 18 世纪晚期由来自德国哥廷根的民族学家
们指导创建的^①，具有较鲜明的德国民族学风格。1932 年，苏
联民族学被取消，理由是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相对立。
1937 年苏联民族学得到恢复，被认定成“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
它研究原始社会中的重要问题，各民族的起源问题，人类学社会
史各阶段人们共同体的形成问题，研究现代世界居民的民族成
分，研究我们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变化过程，即
他们生活在共产主义改造道路上所发生的变化过程”^②。

不幸的是，即便苏式民族学也难以以为继。20 世纪 60 年代，
中苏交恶，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也成了问题。在那些激进的批评家
看来，民族学要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要不就是苏联修正主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只有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研究，
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在 1960—1980 期间，民
族学这个名称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即便是民族学调查也只能
被称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① Vermeulen, Han F., “Origins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thnography and Ethnology in Europe and the USA”, in Han F. Vermeulen et al. (eds.), *Field Work and Footnotes*, pp. 39~5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② 王恩庆、李一夫编：《国外民族学概况》（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0 年编印，第 458~460 页，上卷第 39 页。

20 世纪 80 年代，民族学得到了承认和恢复，1950—1960 年代积累下来的大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资料得到充分整理和利用，一大批有关中国少数民族三种社会形态的著述得到了出版。这个时期的民族学著述基本上是在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进化史模式指引下写成的，学术的张力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依据中国民族志材料丰富、完善摩尔根—恩格斯模式，或援引摩尔根—恩格斯模式和中国民族材料挑战或修正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民族学理论。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后斯大林民族理论和婚姻家庭进化史理论被介绍进来，一度也曾激发了人们对于摩尔根—恩格斯婚姻家庭进化模式以及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质疑和修补。

严格讲，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的再次相碰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应对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变迁的加剧，各种西方人类学理论和话题的冲击，以及大批海外留学人才的回归，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得到迅速发展：研究课题日益国际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日益频繁；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得到了学术体制上的确认和恢复，大批国家重点院校创设了人类学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人类学、民族学已不再是少数民族院校独有的专业，等等。当然，面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日益国际化，也有要求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呐喊。但是，究竟哪些舶来的东西需要本土化，或者说，本土化是否意味着坚持摩尔根—恩格斯进化论和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或重拾儒家社会理论，则有待进一步明朗化。

综上所述，中国人类学曾是舶来的，当下也正在舶来。当然，选编这套文集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中国人类学的舶来性，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忽视了舶来以及考量舶来曾给中国人类学留下的痕迹。